

# 1953年，林徽因和“太太的客厅”的最后时光



1950年，林徽因(右二)与清华营建系教师在清华园工字厅。

“谈笑有鸿儒，只我一个白丁在旁画图。”

那是在清华大学胜因院12号，林徽因的最后一个家。后来成为建筑学家、工程院院士的关肇邨那时23岁，刚从清华大学营建系毕业留校，那段时间每天来这里，帮老师林徽因画图。

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等时来造访。这样的下午茶时光，关肇邨能依稀感觉到30年代那个著名的“太太的客厅”的氛围。但无论是年华的逝去、人事的凋零，还是大环境的改变、健康的恶化，都早已今非昔比。眼前这个常年绵缠于病榻的林徽因，只能用“瘦骨嶙峋”来形容。

林徽因床头放着一张她20年代风华绝世的照片。她指着说：“看啊，这就是当年的林徽因。”接着是一声轻轻的叹息。

时间已走到1953年，林徽因不满51岁生命的最后时光。

## “她的脑子和嘴都非常厉害”

1952年5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担任主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担任副主任，林徽因担任委员。梁思成当时社会职务很多，设计纪念碑的工作主要是林徽因在做。但她生病卧床，梁思成就调刚毕业的关肇邨去帮忙。

1953年2月，关肇邨奉命来到清华大学胜因院。

胜因院是抗战胜利清华复员后兴建的教授住宅区，由林徽因本人参与设计，有两层砖混小楼，也有平房，皆为独栋，梁家所住的12号楼为平房。

关肇邨在梁家客厅用板子支起一张简易的绘图桌。隔壁就是林徽因的卧室，他画好随时拿进去让她审阅修改。

营建系的人都知道，作为国徽主要设计者的林徽因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国徽可不是商标，不能太五颜六色。1953年前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林徽因审稿并做序。她对其中太和殿所用彩图的效果很不满意，写信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哗，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她的脑子和嘴都非常厉害。所谓‘太太的客厅’，其实也因为很多人都想来跟她聊一聊，因为她说话又有内容又有水平，而且又很尖锐。她要是批判一个什么东西，她可以用尖锐而幽默的话，说得你没法反驳。”关肇邨回忆说。

## “乾隆 taste 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

1953年3月初，梁思成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原定时间为一个月，没想到斯大林突然去世，代表团中断日程参加了整个悼念活动，一待就是两个多月。

林徽因常给梁思成写信，告知纪念碑设计的新进展。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会被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抄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

林徽因的主要任务是为碑座和碑身设计全套纹饰。她时常是一阵长时间痛苦的咳嗽，喘成一团，稍稍缓和一些，就接着指导关肇邨的工作。

关肇邨说，纪念碑碑身并不是垂直的，而是略微有一点弧线，使得碑体美观，不笨重，又能增强稳定性。林梁二人都曾告诉关肇邨，要注意这些细节问

题，有机会到十三陵的话，去摸一摸它的碑，体会它丰满、稳定的感觉

其实林徽因倾向于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唐代风格，让关肇邨多看看唐朝的图案。她说，南北朝时期的雕刻图案线条都是硬邦邦的，类似欧洲中世纪刻板的风格，而到唐朝时，图案就有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了，叶子和花瓣都很丰满、优美，类似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风格，图案反映着人文主义情怀。

关肇邨有一次把浮雕的线条画得太柔弱了，林徽因看了说，这是乾隆 taste，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关肇邨也用玩笑的口吻说，如果让我自己来画，我只能画光绪 taste 了(意即更“俗气”一点)。

## 常来的只剩下了金岳霖

当时关肇邨刚留校任教，没什么课，几乎每天都去梁家，一去就是一整天。林徽因对工作安排得很宽松，倒是舍得花时间来喝茶谈话。关肇邨基本上只是上午画图，40%的时间是在陪她聊天。有时候她忽然拿出几张钞票，让他去买点点心或者花生米，说咱们聊一聊。但关肇邨买回来以后，她又吃不下了。

那时候林徽因女儿梁再冰已工作，住单位宿舍；儿子梁从诫在读北大，平时住校。以前儿女绕膝，高朋满座，现在身边没有人了，关肇邨觉得她很寂寞。

很长一段时间，梁家的家庭生活是英国式的。朋友们常常来喝下午茶，他们谈国家建设，谈抗美援朝，谈教学，也谈哲学、文学、艺术，其中北京的城市规划是谈得最多的话题。往往一说到要拆城墙，梁思成就激动起来，有时候林徽因也插进去发议论。他们非常担心中国的传统建筑会随着大规模的建设而覆没，担心北京会失去原有的古城面貌。

慢慢的，常来的只剩下了金岳霖。梁家当年住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金岳霖就住她家后院；搬到新林院8号后，金岳霖又住对门的新林院9号；搬到胜因院后，依然比邻而居。他来时无需通报，自己到沙发上坐下，摇头晃脑地看远方，摆弄太阳镜，喝茶翻书，林徽因也不一定出来相见。有时出来，他就手持一本洋书，为她诵读。

林徽因精神好时，总是滔滔不绝地在谈话，大部分是回忆往事。她的谈话极富感染力。关肇邨记得，她有次讲起自己婚后与梁思成去欧洲旅行，到西班牙格罗纳达的阿尔汗伯拉宫，一睹著名的“狮子院”。当时天色已晚，暮色苍茫中，二人雇了马车穿行在树林里，四下空无一人，只有蹄声得得。到离宫时，天已全黑，守门人放他们进去。他们在寂静无人的宫中，穿过几重庭院，最终进入四周环廊的庭院，突然看到月光下，一群狮子从喷泉下奔出。林徽因说，两人当时就觉得，那份神秘、浪漫，那种异域风格的建筑之美，

不正是对他们所谈的“建筑意”的最好诠释吗？

## 各奔东西的营建系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建筑系并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改名为建筑系，梁思成任系主任，吴良镛任副系主任。

营建学系取《诗经》“经之营之”意。梁思成认为建筑工程系名称太窄，希望将之办成一个融建筑、城市规划、园林景观、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为一体的综合环境设计系，赋予建筑学以广义的内涵和任务，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而院系调整后的新体系和过去完全不同，以学苏为纲。吴良镛回忆，林徽因哭了。

1953年下学期，营建系里凡不是搞建筑的人员都离开了清华，各奔东西了。

对林徽因来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不只是她和梁思成一手筹办起来的清华营建系，还有她视如生命的古建筑。

1953年8月20日，由北京市政府出面，召开了一个“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主持人是副市长吴晗，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言。林徽因抱病做了长篇发言。中途她疲惫异常，以至吴晗请她喝口水、先歇一会儿再说。

最终，这一派的意见没能得到采纳。1954年后，北京的文物古建筑保护形势逆转，城墙被拆除，牌楼被拆迁。对梁思成“复古主义”和“大屋顶”的批判，风雨欲来。

这年冬，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病倒了。为了便于他们养病，北京市委秘书长薛子正专门为他们在校内修整了一个大四合院，并安装了暖气。

吴良镛去看林徽因。当时梁思成已住进同仁医院，只有林徽因躺在一间大屋内。偌大一个四合院里，空荡荡的。她并不谈自己的病，而是与吴良镛谈了关于建筑思想和理论的许多问题。吴良镛感到，她明显地在困惑与彷徨，似乎已疲惫不堪，“失去原来的锐气了”。

不久，林徽因也住进了同仁医院，病房就在梁思成的隔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拒绝再吃药。1955年4月1日，她安静离世。

林徽因的墓是梁思成亲手设计的，上面那块汉白玉花环，来自林徽因设计的天安门纪念碑图案。碑上用营建社特有的字体刻写的“建筑师林徽因墓”，而这几个字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毁，成了一座“无字碑”。

现在，墓已修复。只是那块有些残破了汉白玉花环，是当年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的试刻纹样原件，却无法修补，也无可替代了。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有删节)